

共同体视域下城市民族互嵌社区的空间构建

□ 吕广文 张晓华

社区空间作为构成社会大空间的一个基本单元,是社会大空间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具备了一般意义上社会大空间的物质性、社会性与精神性。根据空间生产理论,社区空间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实体性的物质空间,为居民提供学习、工作、交往、游憩的场所;同时也是居民之间生产社会关系的社会空间,影响社区内居民之间的交往交流,调节社区内的社会关系;还是一个承载着居民共有精神和共有意识的精神空间,能够丰富居民的精神世界,塑造居民的精神意识。社区内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三者之间彼此连接,互相影响,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互嵌式的共有家园。

从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到2021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进一步明确了民族互嵌社区的

构建方向。民族互嵌社区的构建旨在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即在不同民族的持续互动过程中通过各族居民全方位的交融互嵌而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因此,构建民族互嵌社区空间的本质就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出发点的空间生产行为。基于此,城市民族互嵌社区的空间构建应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眼于打造各民族互嵌共生的物质空间、各民族互融共进的社会空间和各民族互认共融的精神空间。

坚持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有机结合,建设各民族互嵌共生的社区物质空间。社区物质空间即“显性空间”或“硬性空间”,是由社区的公共建筑和社区景观等物质实体所组成的物理空间形态,该空间有着明确的界限和范围。城乡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加速了少数民族群众向城市的流动,我国目前已有超过1/3的少数民族人口居于城市和散居地区。在各族群众大融居的背景下,城市民族互嵌社区物质空间的建设

必须注重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将社区的建设主动与所属城市的发展规划接轨。在城市发展规划的框架下,以本地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为依托,以不断实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导向,充分考虑和尊重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性,结合社区的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合理规划社区内居住、娱乐、商业、休闲等功能模块的布局,加强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民族互嵌社区物质空间的构建还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凸显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赋予物质空间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意义。

促进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各民族互融共进的社区社会空间。社区社会空间即“软性空间”,是一种包含社会生产生活在内的社会结构,其核心是对社会关系的构建和表征,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城市民族互嵌社区社会空间的构建应聚焦于社区治理,以党建为引领,引导和鼓励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共

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增强各族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完善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提升社区的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营造开放包容、有序互嵌、和谐互助的社区氛围。以满足各族居民多元多维多样的需求为目标,优化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服务模式,提升社区服务质量,架好联系各族居民的“连心桥”,画好各族居民团结进步的“同心圆”。以实现各族居民全方位互融为宗旨,通过线上和线下各类活动搭建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为各族居民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创造条件,不断扩大各族居民交流互动的范围和频次,不断深化各族居民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交融,促进各族居民共同团结奋斗,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打造各民族互认共融的社区精神空间。社区精神空间即“隐性空间”或“软性空间”,包含情感、品质、意识、信念等思想活动空间。社区是各族居民群众在情感和信任基础

上形成的情感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每一个居民个体对社区空间都应该具有主体间性、积极正向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情感。由此,城市民族互嵌社区的构建必须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入,关注各族居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不断密切各族居民的情感,充实各族居民的精神世界。协同各方力量做好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的教育融入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族居民在居住互嵌、语言互通、文化互融、情感互依的过程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并在此基础上将情感进一步升华为“五个认同”,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茶马古道上的滇黔桂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启示

□ 侯井榕

道路作为基础设施,是各族人民生活的必备部分,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从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来看,国家的强盛往往跟交通的发展密切相关。从秦朝开始修建的灵渠,汉朝的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到隋朝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它们的修建都为当时带来了经济文化的繁荣。经济上,交通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带动经济更快转型,提升地区的经济价值;政治上,方便社会治理,同时提升综合国力,对国际地位的提高有推动作用;文化上,推动各地区的文化发展与传播。

自古以来,滇黔桂及其周边区域皆为各民族交往的广阔舞台,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做出很大贡献。这些区域因为句町文化、茶马古道、马帮而形成了民族交融区。

作为世界有名的古道之一,茶马古道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茶马古道兴起于唐宋时期,横跨桂、滇、川、藏等地,见证了沿途汉、藏、纳西、白、回、普米、傈僳、壮、侗、彝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各民族共同建设、共同参与、互相扶持、共同发展的联系纽带。对今天华南、西南多民族聚居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启示。

茶马古道推动了滇黔桂各地的经济交流活动。宋代广西形成了三大博易场:横山寨博易场、永平博易场及钦州博易场。作为茶马古道的东起点,广西百色田东横山寨博易场是宋朝在广西买云南马匹的重要场所,交易的物品有马、羊、香料、药材、盐、茶、锦、彩、瓷器,甚至包括书籍等文化用品。因为参与的群众众多,商品流动频繁,横山寨曾被誉“中国西南最大的贸易市场”。从北向南、由南往北的商品流动,推动了沿线周边圩市的形成和发展。

左右江流域地处桂、黔、滇三省区交界地带,是重要的大西南商品集散地;与越南接壤,是中越经济交往的前沿。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大西南广阔的腹地招徕了大批商人,他们集资建会馆进而定居下来,促进了区域商业经济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百色曾经有各地商业会馆,包括粤东会馆(尚存)、广东会馆、云南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灵州会馆(尚存)及横山寨遗址旁

的田东县祥周镇上发现的清代乾隆年间兴建的岭南会馆,这些都是广西与云南、广东等地经济交流的实证。

茶马古道推动了中原与滇黔桂各地的文化交流。茶马古道上的商业经济交流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中原文化与滇黔桂文化交流。唐朝至宋元时期的百色壮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处于一种较为融洽的商业交往状态。来往贸易的商人中除了当地的壮族先民和周边各族民众外,还集结了来自东南沿海和中原一带的汉人以及西南诸蕃国的各民族商人。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区域,在交往的过程中带来了本民族生产技术、特色文化和风俗习惯,使各民族文化交流在一起,碰撞在一起,催生了新的文化。

儒学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了广西各民族思想的转变。汉民族进入广西并带来了儒学等教育思想,他们在广西各地创办学堂,使壮族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教育。据考古发现,百色在阳圩等地发现了几个营盘军事阵地。这突出了百色边镇的重要性。随着边镇的设置,官员人柱主政,儒家文化在广西得到深入传播。从各地文庙的建立可见一斑。根据《广西通志》和《广西教育史》记载,从隋唐到明清,广西各级官学共有84处,内设孔庙的有79座。宋代的文庙分别沿着漓江到桂江、西江流域到南宁、浔江-黔江-柳江三条线路设立分布。明清新建的孔庙则主要集中在桂西西江上游的羁縻州,即左、右江流域的新宁州、太平府、左州、土田州、奉议州等地兴建的19所文庙,以及红水河、龙江、融江流域的河池州、思恩县、怀远县、都安县、罗城县等地兴建的10所文庙。文庙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的设立及文庙的修建体现了各地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土司土官便是受到文化融合的影响不断改变思想观念,从而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百色的壮族人民在与其他民族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吸收了他们的先进文化,而在长期的交往融合中,从其他地区进入百色的民族也逐步融入壮族中。

茶马古道上瓷器的流通弘扬了华夏文明,推动滇黔桂等地的中华文化认同。宋代,社会经济比较繁荣,赋予瓷器一定的社会地位。根据《郊庙奉祀礼文》记载,北宋年间,瓷器开始用于祭祀当中,上流阶层也非常崇尚,宋代

的官窑制度更是直接提高了瓷器的地位,文人的茶文化离不开精美的瓷器,瓷器文化逐渐上升为民族文化和华夏文明的一部分。瓷器在广西横山寨的考古发现,说明了瓷器在茶马古道的流通,说明了瓷器文化通过茶马古道传播于各少数民族之间,推动了文化认同,对今天的中华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横山寨考古挖掘出的瓷器部分比较精致,其中有景德镇的瓷器,而且发现了3-4个瓷窑。这些或精致或相对普通的瓷器,证明横山寨博易场的贸易联通内外,所以说茶马古道广西段延伸出去就相当于中国南部的丝绸之路,是中外文明的交汇点。

茶马古道加强了滇黔桂的语言文字交流交融。语言是各民族之间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在横山寨博易场鼎盛时期,各民族来往络绎不绝,商贾们语言不通,无法交流,翻译便应运而生。翻译者作为中介,不仅为交易双方创造经济效益,还能建立良好的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各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广西大部分地区使用的西南官话,在广西则主要称为桂柳话。根据《百色历史通稿》记载,当时靖西、德保、那坡的客商可以使用官话(桂柳话)与右江河谷壮、汉民族及来自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人交流;甚至有的外来官员和客商还能入乡随俗,学会右江河谷民族方言(壮话),适应壮族生活习俗等。如今百色的少数民族把西南官话称为汉话,应该是过去桂滇黔三省区在茶马古道沿线做生意,汉族主要使用西南官话,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易和交流交往所造成的现象。各民族之间通过语言沟通,使各民族的思想观念产生碰撞,并逐渐加深感情,融合成一个整体。其语言交融仍影响着现今各民族的交流交往。

横山寨贸易带动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的交汇互融。壮族的稻作文化、铜鼓文化,汉族的青铜技术,各民族文化就是在这里相互交叉、融汇,又通过这条古道文化走廊源源不绝地传播到西南各地。横山寨作为军事要地虽在元代撤销,但它沿江商埠的功能延续很长时间。这条古道沿线的各民族依旧保持着经济上的往来和文化上的交流,说明了百越之后的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频繁与深化。

茶马古道增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历史上,茶马古道是滇黔桂各地之间重要的交通要道,是沿线各民族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经济上各民族互通有无,通过茶马、盐马、瓷器及其他商品的交易,互相信任,互助共赢,了解彼此文化,加深感情,文化上彼此认同,从而形成民族团结景象。

茶马古道离不开马帮,马帮文化是茶马古道文化的一部分。马帮不只活跃于云南到西藏、四川到西藏路段,马帮也在滇黔桂之间活动。他们在古道上运输货品,做商品交易,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活动及文化交流。云贵马帮把云南贵州当地的特产运到广西,然后再把广西的特产运到贵州做交易。广西的马帮亦然。百色的凌云、田林、乐业等县都曾经有很多马帮。今天的田林县浪平乡还有超过1000人外出,组成马帮做运输生意脱贫致富。

茶马古道促进稳边、兴边,维护国家统一。云南广西接壤越南、缅甸等国,属于边疆地区。唐宋在百色田东设横山寨、横山寨,说明中央政府明确把百色纳入中央控制的疆域中,在云南、广西、贵州茶马古道连线上采取的关市马、盐马、茶马等政策,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宋代邀请少数民族首领参与买马,给予他们权力参与贸易,设立博易场,使得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形成经济依赖的关系,起到了安抚作用,同时沿线设置的马驿、营盘等可以稳定地方社会、维护国家安全、巩固国家统一,起到稳边、兴边富民的作用。

茶马古道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茶马古道作为西南多民族文化互通的载体,时间上跨越数千年,空间上穿越桂、川、藏、滇、黔等地区数千公里,把这些地区带到了民族的政治舞台上,实现了民族国家空间控制的能力,这些区域的少数民族成为“国家的人”,如此,滇黔桂川藏等地实现由点到面的链接和推动,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与构建。此外,茶马古道从广西及云南往外延伸,与越南、缅甸等地联线,成为大西南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是重要的民族互动之路,是文化交融之路,是文明交汇之路,这条古道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重要贡献。